

目 录

总 序	文秋芳 v
前 言	张 虹 viii

第一章 外语教材使用概述	1
1.1 教材的内涵	1
1.2 外语教材的内涵	3
1.2.1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作为内容的教材	4
1.2.2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期： 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	5
1.2.3 近十年（2015—2024）：作为工具的教材	7
1.3 外语教材的重要性	9
1.4 外语教材使用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11
1.5 外语教材使用的重要性	19
1.5.1 政策引领	19
1.5.2 学界呼吁	20

第二章 外语教材使用实践	22
2.1 外语教材的使用主体及其行为	22
2.1.1 学生视角	22
2.1.2 教师视角	26
2.2 外语教材解读思路	28
2.2.1 编写理念 / 教材特色	29
2.2.2 主题选择	30
2.2.3 语言素材	32
2.2.4 活动设计	34

2.3 外语教材改编策略	35
2.3.1 外语教材改编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35
2.3.2 外语教材改编原则与案例	38
第三章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理论框架	43
3.1 社会物质主义取向	43
3.1.1 社会物质主义取向的内涵与要素	43
3.1.2 社会物质主义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48
3.2 社会文化理论	52
3.2.1 社会文化理论的内涵、起源与核心理念	52
3.2.2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55
3.3 活动理论	58
3.3.1 活动理论的内涵、演变与核心理念	58
3.3.2 活动理论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60
3.4 复杂理论 /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	63
3.4.1 复杂理论 /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定义、起源与特征	63
3.4.2 复杂理论 /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65
3.5 生态理论	67
3.5.1 生态理论的定义、起源与特征	67
3.5.2 生态理论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70
3.6 注意力—相关性—自信心—满意度模型及其视角下的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73
3.7 语言社会化理论及其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75
3.8 课程实施层级理论及其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76
第四章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方法	78
4.1 质性研究	78
4.1.1 个案研究	78

4.1.2 民族志	85
4.1.3 叙事研究	86
4.1.4 形成性干预研究	89
4.1.5 教材使用质性研究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	91
4.2 量化研究	94
4.2.1 量化研究方法概述	94
4.2.2 量化研究方法在外语教材使用研究中的运用	98
4.3 混合研究	102
4.3.1 混合研究方法概述	102
4.3.2 混合研究方法在外语教材使用研究中的运用	105
4.4 实践研究	111
第五章 外语教材使用相关研究综述	113
5.1 教师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113
5.1.1 教师使用教材的行为	113
5.1.2 教师使用教材的影响因素	114
5.1.3 教材使用与教师学习	116
5.2 学生视角下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119
5.2.1 外语教材使用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120
5.2.2 学生的外语教材使用过程	121
5.2.3 外语教材使用中的学生能动性	122
5.3 教师使用教材与学生使用教材的关系	122
5.4 新形态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125
5.4.1 新形态教材的使用效果	125
5.4.2 使用新形态教材所面临的挑战	128
第六章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选题建议	129
6.1 选题视角	129
6.1.1 忠实视角	129

6.1.2 实施视角	130
6.1.3 比较视角	130
6.1.4 诠释视角	131
6.2 选题路径	132
6.2.1 从国家政策中寻找选题	132
6.2.2 从课堂教学实践中挖掘选题	134
6.2.3 从教材使用研究的现有文献中提炼选题	135
第七章 外语教材使用的回顾与展望	138
7.1 外语教材使用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138
7.2 外语教材使用实践的回顾与展望	139
7.3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41
7.3.1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展望	141
7.3.2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主题的回顾与展望	142
参考文献	146

总 序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精心策划、隆重推出的系列丛书，包含理论指导、科研方法、教学研究和课堂活动四个子系列。本套丛书既包括学界专家精心挑选的国外引进著作，又有特邀国内学者执笔完成的“命题作文”。作为开放的系列丛书，该丛书还将根据外语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不断增加新的专题，以便教师研修与提高。

编者有幸参与了这套系列丛书的策划工作。在策划过程中，我们分析了高校英语教师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考察了一线教师的需求，最终确立这套丛书选题的指导思想为：想外语教师所想，急外语教师所急，顺应广大教师的发展需求；确立这套丛书的写作特色为：突出科学性、可读性和操作性，做到举重若轻，条理清晰，例证丰富，深入浅出。

第一个子系列是“理论指导”。该系列力图为教师提供某学科或某领域的研究概貌，期盼读者能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某领域的核心知识点与前沿研究课题。以《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一书为例，该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抓住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要点和富有争议的问题，动态展开叙述。每一章的写作以不同意见的争辩为出发点，对取向相左的理论、实证研究结果差异进行分析、梳理和评述，最后介绍或者展望国内外的最新发展趋势。全书阐述清晰，深入浅出，易读易懂。再比如《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一书，全书分为理论篇、教学篇与研究篇三个部分。理论篇阐述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观、教学观与学习观，以及与二语教学相关的认知语言学中的主要概念与理论；教学篇选用认知语言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探讨应用到中国英语教学实践的可能性；研究篇包括国内外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的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介绍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二个子系列是“科研方法”。该系列介绍了多种研究方法，通常是一本书介绍一种方法，例如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行动研究、有声思维、语料库研

究、微变化研究和启动研究等。也有的书涉及多种方法，综合描述量化研究或者质化研究，例如：《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分析》《应用语言学中的量化研究与分析》和《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等。凡入选本系列丛书的著作人，无论是国外著者还是国内著者，均有高度的读者意识，乐于为一线教师开展教学科研服务，力求做到帮助读者“排忧解难”。例如，澳大利亚安妮·伯恩斯（Anne Burns）教授撰写的《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一书，从一线教师的视角，讨论行动研究的各个环节，每章均有“反思时刻”“行动时刻”等新颖形式设计。同时，全书运用了丰富例证来解释理论概念，便于读者理解、思考和消化所读内容。凡是应邀撰写研究方法系列的中国著作人均有博士学位，并对自己阐述的研究方法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有的运用书中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硕士、博士论文，有的采用书中的研究方法从事过重大科研项目。以秦晓晴教授撰写的《外语教学问卷调查法》一书为例，该书著者将系统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根据实施问卷调查法的流程，系统地介绍了问卷调查研究中问题的提出、问卷项目设计、问卷试测、问卷实施、问卷整理及数据准备、问卷评价以及问卷数据汇总及统计分析方法选择等环节。书中各个环节的描述都配有易于理解的研究实例。

第三个子系列是“教学研究”。该系列与前两个系列相比，有两点显著不同：第一，本系列侧重同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研究能力；第二，本系列所有著作的撰稿人均为中国学者。有些著者虽然目前在海外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出国前曾在国内高校任教，也经常回国参与国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系列包括《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英语口语教学与研究》《翻译教学与研究》等。以《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一书为例，著者王艳副教授拥有十多年的听力教学经验，同时听力教学研究又是她博士论文的选题领域。《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一书，浓缩了她多年来听力教学与听力教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全书分为两部分：教学篇与研究篇。教学篇中涉及了听力教学的各个重要环节以及学生在听力学习中可能碰到的困难与应对的办法，所选用的案例均来自著者课堂教学的真实活动。研究篇中既有著者的听力教学研究案例，也有著者从国内外文献中筛选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听力教学研究案例，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阐述。

第四个子系列是“课堂活动”。该系列汇集了各分册作者多年来的一线教学经验，旨在为教师提供具体、真实、具有较高借鉴价值的课堂活动案例，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该系列图书包括《英语阅读教学活动设计》《英语听力课堂活动设计》《英语合作学习活动》等。以《英语阅读教学活动设计》一书为例，阅读教学是学生学习语言知识和教师培养学生思维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该书第一作者陈则航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英语阅读教学研究，希望通过该书与读者分享如何进行具体的阅读教学活动设计，探讨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落实阅读教学理念。该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在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这三个不同阶段教师可以设计的阅读教学活动，并且介绍了阅读测评的目的、原则和方式。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通过阅读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第三部分展示了教师在阅读课堂中的真实教学案例，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与点评，以期改进阅读教学活动设计提供启示。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内容全面，出版及时，必将成为高校教师提升自我教学能力、研究能力与合作能力的良师益友。编者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对高校外语教师个人专业能力的提高，对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前言

教材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载体，是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支撑，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本保障（潘信林、袁帅，2025）。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不仅需要完善教材使用监测等机制，还需要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研究层面帮助教师用好教材、开展教材使用研究，这是必须抓实抓牢的关键任务。教师不仅仅是教材的被动接受者和使用者，他们对教材的理解以及基于教材开展的教学实践会直接影响教材在育人育才方面的效果。如果教师能够学会研究教材使用行为、评估教材使用效果，并在课堂中不断优化教材使用，将会进一步提升教材的育人价值，创生新的教育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外语教材研究领域多聚焦教材的编写与评价，而对教材使用这一关键环节的内涵、理论机制、实践操作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相对有限。本书旨在对这一领域深入探索，为外语教师、研究者及教育管理者提供一部系统探讨教材使用理论、实践与研究的学术著作。

本书共七章，梳理了外语教材使用领域的前沿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可为教材使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还可为开展教材使用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和具体可操作的建议。

第一章主要介绍外语教材使用相关概念及其重要性。首先，本章阐释教材的内涵，明确教科书是教材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呈现教材定义的历时变化，并依据形态、功能、使用者、使用场景对教材进行分类。其次，本章聚焦外语教材的内涵，梳理出近三十年来其定义的演变过程：20世纪90年代前期为“作为内容的教材”，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扩展为“作为内容/任务的教材”，近十年（2015—2024）则发展为“作为工具的教材”。本章还介绍新形态外语教材在形态、结构和使用方式上的创新。然后，本章探讨外语教材的重要性，尽管教材的必要性仍存在争议，但外语教材作为课堂教学载体，在语

言知识传授、文化意识培养、思维品质塑造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对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本章围绕外语教材使用的内涵，梳理国内外相关定义及其特征，并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维度给出本书对外语教材使用的操作性定义。最后，本章阐述外语教材使用的重要性，分别从政策引领和学界呼吁两个角度展开，强调其在教材建设和教学实践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章围绕外语教材使用实践，系统阐述不同主体的教材使用行为、教材的解读思路与改编策略。首先，本章聚焦外语教材使用的核心主体——学生与教师，剖析了二者的使用行为与特征。学生视角下的阐述结合国内外研究案例，展现学生在文化适应中的抵抗行为、对不同形态教材的使用反馈、教材使用能动性发挥的具体表现以及教材使用效果；教师视角下的阐述则区分“教教材”“不教教材”“随意使用教材”等须规避的行为，强调“用教材教”这一適切理念，即深入解读与有原则地改编教材。其次，本章提出从编写理念/教材特色、主题选择、语言素材、活动设计四个维度进行教材解读，以充分挖掘教材的语言学习价值与育人价值，举例说明如何结合教材前言把握编写理念，分析教材单元主题与“四新”领域的关联，解读语言素材的跨学科内涵，以及梳理活动设计的逻辑链条。最后，本章阐述教材改编的必要性与原则，并通过具体的研究和实操案例展示增加、删减、调序、改写等改编策略的实操方法，强调改编应立足学情、对接教学目标，同时提出提升教师改编素养的建议。

第三章介绍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领域常用的八个理论/取向框架，包括：社会物质主义取向、社会文化理论、活动理论、复杂理论/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生态理论、注意力—相关性—自信心—满意度模型、语言社会化理论和课程实施层级理论。本章先厘清每个理论的核心要素与发展脉络，再通过具体研究案例展示理论应用的实践路径，最后提出研究方向。社会物质主义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关注教材作为物质元素在课堂内外的作用，探究教材使用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元素的内动和缠绕，分析不同教材使用方式中涌现的多样化教学或学习效果。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多聚焦教材作为中介的调节作用，尤其是教材对教师、学生等教材使用者及使用者之间的教学关系的调节，考察教师教材使用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认知、学生需求等，同时涉及教材使用中学习者的潜能发展等方面。基于活动理论开展的研究将教材使用视为具有结构的活动系

统，关注系统中各要素的互动及系统间的互动，探究教师和学生教材使用中的能动性、动机及影响因素等。复杂理论/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将教材使用看作复杂动态系统，分析其复杂性、动态性和非线性等特征，探讨系统中各因素的交织作用及教材使用行为与结果的非线性关联。生态理论视角下的研究聚焦教材作为给养在课堂生态中的作用，探讨教材与教师、学习者、教学环境等的互动，分析教材使用如何影响课堂生态中的各元素，以及教材为语言学习创造的机会。注意力—相关性—自信心—满意度模型视角下的研究关注基于该模型设计的教材及使用模式对学生学习动机、态度和成效的影响，以及该模型在评估教材使用动机中的应用。语言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的研究主要考察学习者和教师如何通过语言使用教材，并关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话语体系。课程实施层级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将教材使用置于不同课程层级中，探讨教师教材使用与学生感知之间的关联。

第四章主要介绍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混合研究和实践研究这四种方法及其在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领域的应用或展望。质性研究主要用于探究教材使用的动态过程，通过个案研究、民族志、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借助课堂观察、访谈、文件等数据收集方式，理解师生与教材互动的行为，深描教材使用的过程与情境性因素。量化研究包括用准实验设计、调查研究等类型，揭示教材使用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对教和学的影响，并通过标准化工具与统计分析，呈现教材使用的普遍特征与规律。混合研究融合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既通过数据统计把握教材使用的整体趋势，又深度解读现象背后的原因，例如，结合问卷数据与访谈内容，阐释教材使用动机与使用行为或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践研究倡导教师以自身教材使用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行动研究、课例研究等方式，从局内人的视角更好地观察和研究自己的教材使用情况，推动教材使用从实践经验向理论机制转化。

第五章围绕外语教材使用相关研究展开综述，内容涵盖教师视角和学生视角下的教材使用情况、教师与学生在教材使用中的关系以及新形态外语教材使用研究。教师视角下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层面：其一，教师使用教材的主要行为策略，包括对教材内容的增加、删减、修改及顺序调整；其二，影响教师教材使用行为的多层级因素，既涉及教师自身的信念、教材观与过往经历，又包

含学情、教材设计与资源丰富度，还与学校决策、课程安排等因素相关；其三，教材使用与教师学习的关系，阐述教材使用对教师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意及专业实践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学生视角下的研究聚焦学生与教材的互动过程，包括教材使用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如对学生语言能力、学习动机、情感状态及参与度的影响；分析学生在教材使用中的接受行为与感知体验；关注学生在教材使用中的能动性表现。本章还探讨教师使用教材与学生使用教材之间的关联，指出二者并非割裂，教师的教材使用方式会影响学生对教材的态度与使用行为，学生的反馈也会作用于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调整。最后，针对新形态外语教材，本章梳理其使用效果，如对学生学习方式、素养技能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教师能力与身份转变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指出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资源利用率低、技术适应难等挑战。

第六章围绕外语教材使用研究的选题，从选题视角与选题路径两个维度，为研究者提供具体的思路框架。在选题视角方面，本章基于前人研究，提出了忠实视角、实施视角、比较视角与诠释视角。忠实视角以教材为起点，分析教师对教材的遵循程度与改编行为，可通过构建量化指标衡量教师的教材使用与教材设计、课标理念的吻合度。实施视角认为教材不是静态的分析对象，强调教师、学习者与教材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关注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内容解读和调整行为，以及这些互动对教师学习的影响。比较视角旨在为教材设计与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分析方法。该视角通过对比不同地区和背景下的教材使用行为，揭示影响教材使用的多种因素，进而更好地呈现教材、教学和学习之间的关系。诠释视角聚焦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与阐释，强调教师运用自己的过往经验、知识和技能等去理解教材，与编写者的教材编写理念达成一种视域融合。在选题路径方面，本章提出三条具体路径。一是从国家政策出发，建议研究者关注与教材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结合政策中对教材体系、思政融入、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要求，挖掘符合国家需求的研究方向；二是从课堂教学实践切入，倡导研究者以真实课堂为研究场域，聚焦师生与教材的实际互动，基于课堂数据，关注新教材使用中的困惑和新形态教材的应用等现实问题；三是基于已有文献，建议研究者追踪相关期刊专栏与研究脉络，从中发现待探索的领域，如特定教材类型的使用、不同学段或语种的教材使用等。

第七章从理论、实践与研究三个维度出发，回顾与展望外语教材使用的研究。在理论维度，本章先梳理了教材使用研究的常用理论视角，包括社会物质主义取向、社会文化理论、活动理论等，强调理论选择需要兼顾解释性、层次性与迁移性，即能否揭示现象本质、厘清要素关系、实现理论化实践，并指出使用理论应超越机械套用，深入挖掘其深层内涵。在实践维度，本章回顾教材使用主体（如教师、学生）的实践现状：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存在使用策略单一、改编能力不足等问题，学生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编写者与政策制定者在配套资源建设方面尚有提升空间。针对这些问题，本章提出实践优化方向：教师应提升教材调整与改编能力以适应课标要求与学生需求；学生应提升自主性与思辨能力；编写者应完善配套资源并增强教材开放性；政策制定者应推动教材研究纳入课程体系。本章也倡导建立跨主体、跨地域、跨学科、跨学段的教材使用学习研究共同体，促进多方协同，形成教材建设闭环。在研究维度，本章主要从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进行回顾与展望。研究方法部分总结了质性研究、量化研究与混合研究的使用情境，同时指出当前方法应用中存在的以短期研究为主、混合方法整合不足等问题，提出加强历时研究与教师实践研究的方向。研究主题部分在回顾教师、学生视角及新形态教材使用研究的核心主题的基础上，提出外语教材使用层级系统，将研究主体拓展至学校、教材编写者、教师教育相关方，分析各主体在教材编写、选用、使用、反馈等环节的角色，以及政策、文化、教材本身等多维度影响因素。

本书主要面向四类核心受众：一线外语教师、外语教材研究者、外语教材编写者与教育管理者。当前，我国外语教师队伍规模庞大，在专业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些从事非英语教学的外语教师虽具备从事教材研究的意愿，但因语言障碍难以直接获取以英文为主的国际前沿研究成果；相当多的大中小学外语教师虽是教材使用主体，但因很难准确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尚未掌握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而难以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跃升。外语教材研究者在整合国内外零散研究成果、结合实践案例拓展研究方向等方面均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外语教材编写者在精准对接一线师生使用需求和让教材更贴合教与学实际需求方面仍有优化空间。教育管理者在完善教材使用审查监督机制时，也可进一步强化科学分析依据与评估方法的支撑。

我们撰写此书，希望能够为对外语教材使用研究感兴趣的一线教师和研究者提供外语教材使用的相关理论指导、实践指南，以及研究方法与路径，帮助他们储备外语教材使用研究知识，发挥自身的教学优势和语言优势，推动我国大中小学多语种外语教材使用理论的构建、实践的创新与研究的深化。我们也希望为外语教材编写者和教育管理者提供一线教材使用现状分析和研究依据，推动外语教材编写质量的提升与教材使用审查、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构建我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背景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已成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新要求。本书的出版，既是对“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政策的具体落实，也是推动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尽管当前本土教材理论研究尚处于积累阶段，但我们相信，通过持续深耕教材使用这一关键领域，中国外语教育工作者将在该领域逐步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

书中疏漏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系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 2021 年度重点项目“服务文明互鉴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DI145-8）阶段性成果。

张 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5 年 8 月

第一章 外语教材使用概述

本章旨在系统阐释外语教材使用的核心概念及其在研究领域中的价值。本章首先聚焦教材的内涵，明确其广义与狭义定义，然后从历时视角梳理既有文献中外语教材定义的演变，接着进一步阐述外语教材的重要性，重点分析其在推动外语教育发展和培养外语人才中的关键作用，然后回顾学术界对外语教材使用的概念界定，归纳其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操作性定义，最后结合政策导向与学界呼吁，深入探讨外语教材使用的重要性。

1.1 教材的内涵

教材是一个多维度、多功能的概念，自 19 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作正式教学中的中介工具，用来传递规范化的知识 (Sammler, 2018)。从广义的维度来看，教材是人们按照教育目标，遵循相应的教育规律进行组织的教学资源 (曾天山, 1995)。教材的范畴包括但不限于教科书、教师用书、练习册、音像资料和数字资源等。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教学过程的基础，在教与学的活动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顾明远, 1990)。在狭义的定义中，教材往往特指教科书。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界定：教科书亦即“课本”，是依据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 1985, 转引自王攀峰, 2019)。教科书应以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依据，包含课程标准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学科内容，但要避免成为课程标准的复刻。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只是教科书的参考框架，教科书则需要努力完成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教学论转化” (石鸥、石玉, 2012: 97)。教科书在教材中使用最广、内容最成熟、比重最大 (顾明远, 1990)，是教材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从教科书的别名“课本”中就能得到体现。课本，课程之本也 (束定芳, 2023)，通常需要按照一定的学科逻辑和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进行编排，包含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必要的教学指导。

在英文语境中，教材的常用术语包括 textbooks、coursebooks、course

materials、teaching materials 和 learning materials 等。通过梳理国际相关领域文献，我们可以观察到教材研究领域“教材”这一英文表述的历时变化（见表 1.1）。从较为狭义的教科书（textbooks、coursebooks），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材料（teaching materials、materials），再到目前关注学习者的学习材料（learning materials），再到学习材料与教学材料的融合（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这些表述的变化反映了教材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教学论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迭代。

表 1.1 英文语境下“教材”的不同表述

文献	英文表述
Cunningsworth (1979)	course materials
Apple & Christian-Smith (1991)	textbooks
Cunningsworth (1995)	coursebooks
Ellis (1997) Richards (2010) Harwood (2010) McGrath (2013)	teaching materials
Garton & Graves (2014)	materials
Tomlinson (2011)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	learning materials
Guerrettaz et al. (2021)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依据不同的标准，教材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从形态角度来看，教材可以分为纸质教材、数字教材和新形态教材等（杨莉芳，2024）。按照功能的不同，教材可以分为知识类教材、参考类教材和技能型教材等。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教材可以分为学生用书、教师用书和自主学习材料等（Richards, 2010）。按照使用场景的不同，教材可以分为地方性教材（locally-produced coursebooks）和全球性教材（global coursebooks）（McGrath, 2013）。

1.2 外语教材的内涵

在外语教育领域，关于“教材”这一概念的定义纷繁复杂，众说纷纭 (McGrath, 2013)。外语教材这一概念难以界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共时的多样性。与其他学科教材类似，外语教材与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相辅相成、紧密相连 (钟启泉, 2019)，而全球多元化的外语教学环境又催生出各式各样的教育政策与教学方法，这些都可能影响专家学者在不同语境下对外语教材的界定 (Guerrettaz et al., 2021)。二是历时的发展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的教学技术和工具不断涌现，如电子书、多媒体教学软件和在线学习平台等。这些技术和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外语教材的形式和内容，进而丰富了教材的定义。为清晰阐释何为外语教材，本小节首先梳理了既往文献中关于（外语）教材的定义，并通过拆解定义中的关键概念，分析各定义的异同，从而归纳总结出这些定义的特点。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外语）教材定义的文献数量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对外语教材的界定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界对（外语）教材的界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作为内容的教材、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以及作为工具的教材（见表 1.2）。以上界定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1）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外语教材主要被视作传递知识的“内容载体”；（2）随着时代的演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期，（外语）教材的内涵从“重内容”转向“内容与任务并重”，不仅认可教材传递内容信息的作用，而且更加强调以教材活动设计引导学生在真实任务情境中使用语言；（3）近十年（2015—2024），专家学者更倾向于将（外语）教材视为一种“工具”，即任何在特定情境下具有语言教学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教材。这体现出“万物皆可为学习材料”（下文将“学习材料”简称为“学材”）的特点，凸显了教材作为一种“工具”在支持学习者自主学习和多元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阶段性的变化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语言学理论、教学论以及不同教学流派的发展紧密相连。每一时期对外语教材的界定都深受当时外语教学论的影响，体现了教育理念的演变与时代的进步。

表 1.2 近三十年学界对外语教材的不同界定

文献	内涵	焦点	范围
Apple & Christian-Smith (1991)	作为内容的教材	教	教科书
Brown (1995)	作为内容的教材	教	任何系统的论述
顾明远 (1990)	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	教 / 学	文字教材（含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图表和教学参考书）和视听教材
日本课程学会 (2001)，转引自钟启泉 (2019)	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	学	/
Harwood (2010)	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	学	纸质教材、视听文本以及相关的练习和活动
Fuchs & Henne (2018)	作为工具的教材	学	/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	作为工具的教材	学	课本、光盘、故事、歌曲、视频、动画、词典、手机交互、讲座、照片、练习、活动、任务、演示、项目
Guerrettaz et al. (2021)	作为工具的教材	学 / 教	在学习者或教师的感知领域内的物理实体、文本、环境、标志、技术

注：此表所涉及的教材具体内涵请见本书第 4 页至第 7 页的内容。

1.2.1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作为内容的教材

教材的第一种内涵是“作为内容的教材” (materials as content)，即教材是语言知识的载体和文化知识的来源。这一内涵强调教材传递信息的作用 (Breen et al., 1979; Mishan, 2022)，具体见以下两个定义。

Textbooks are the mainstay of **schooling**, conveying much of the **knowledge** students receive.¹

(Apple & Christian-Smith, 1991: I)

Materials will be defined here as any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techniques** and exercises to be us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Brown, 1995: 139)

在上述定义中，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首先，教材被视作知识（knowledge）的载体与对语言技巧的系统性描述（systematic description），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客体。其次，教材服务于学校教育（schooling）和课堂教学（classroom teaching），聚焦“教”这一过程，较少关注学生的“学”，且教材出现的场域也集中在学校和课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空间的限制。最后，在教材外延方面，教材主要指教科书和系统的文字论述，尚未涵盖多模态的教材。

这一时期对外语教材的界定可能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Richards & Rodgers, 2014），并受限于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论（王文斌、李民，2016）。这种界定将教材视为脚本（scripts），认为教材主要用于传授词汇、句法和篇章等知识（Tomlinson, 2010a, 2010b）。

1.2.2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期：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

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逐步发展，课程与教学领域开始出现教学法的转向，愈发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Richards & Rodgers, 2014）。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期，教材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学界在认同教材传递内容信息的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教材促进语言使用的作用，因而出现了“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materials as content and tasks）这一内涵。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不仅涵盖静态的文本内容，还包含以任务形式呈现的学习活动，这些学习活动能够引导学生在真实的

1 笔者在此处及后文对教材定义中的一些表述进行了加粗处理，以便读者更清晰地看出不同定义或表述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任务情境中进行语言的使用与学习 (Breen et al., 1979; Mishan, 2022)。这一时期的教材相关定义如下。

教材 (subject matter) 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 是教学的主要**媒体**。通常按照课程标准 (或教学大纲) 的规定, 分学科门类和年级顺序编辑。包括**文字教材** (含**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图表和教学参考书等**) 和**视听教材**。

(顾明远, 1990: 282)

所谓教材是教学中师生**学习活动的直接对象**, 习得学科内容 (知识、技能、态度等) 的**手段**。

(日本课程学会, 2001, 转引自钟启泉, 2019: 1)

... materials is a term used here to encompass **both texts and language-learning tasks**: texts presented to the learner in **paper-based, audio, or visual form, and/or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built around such texts. This definition is intentionally broad in order to include **locally produced handouts** a teacher uses with a single class, as well as the **textbooks produced by major publishing houses and distributed globally**.

(Harwood, 2010: 3)

从上述定义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对教材的界定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 教材不仅仅是静态文本 (texts), 还可以包含语言学习任务 (language-learning tasks), 因此教材被视为教与学之间的桥梁 (如主要媒体、手段等)。教材逐渐被认为是教与学动态互动中的中介或活动, 对教学活动起到了一定的建构作用, 并非只是静态的知识载体。其次, 教材关注的焦点不仅局限于“教”, 也关注了学生的学习 (如学习活动等)。教材应该更多地服务于学生的“学”, 这一转向可能是受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论的影响 (王文斌、李民, 2016)。最后, 教材的外延逐渐扩大, 包含了视听材料、学习活动、课堂讲义等内容, 不再局限于教科书与书面文本材料。

1.2.3 近十年（2015—2024）：作为工具的教材

教材的第三种内涵是“作为工具的教材”（materials as tools），即任何在特定情境下具有语言教学意义的人、物质或活动，都可以被视作教材（Guerrettaz et al., 2021; Mishan, 2022）。此处的“工具”可以被理解为活动理论中的工具，即主体用来执行活动的物理或符号性工具（Engeström, 2001）。在教学的语境下，工具即教师和学生为达成教与学的目标所使用的中介，如树皮、松针、一根掉落在地上的树枝等（Engman & Hermes, 2021）。这一时期的教材相关定义如下。

A textbook is conventionally **a tool** designed for students or pupils **to learn, be taught, or work from** and which, according to school type or subject, is adapted to the respective curricula or standards and the specific aims, competences, and content defined within.

(Fuchs & Henne, 2018: 25)

... materials are **anything** that can be used by language learners to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of the target language. So materials could be **a coursebook, a CD ROM, a story, a song, a video, a cartoon, a dictionary, a mobile phone interaction, a lecture, or even a photograph** used to stimulate a discussion. They could also be **an exercise, an activity, a task, a presentation, or even a project**.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 2)

Thus, we define LLT¹ materials as follows: **(a) physical entities, (b) texts, (c) environments, (d) signs, and (e) technologies** within the perceptual field of the learner(s) or teacher(s); these are used with the ultimate intention of facilitating **LLT** and in some sort of principled way.

(Guerrettaz et al., 2021: 11)

这一时期对教材的界定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在教材的功能方面，教

1 此处的 LLT 是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的缩写。

材被视作工具 (tool) 或者任何可以促进语言学习的事物, 更加突出其在教与学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这一观念可能是受到活动理论和生态给养概念的影响 (Engeström, 2001; van Lier, 2004), 认为教学主体 (教师、学生) 应有效使用各种工具 (纸质教材、应用软件、网络资源等) 来达成教与学的目标。其次, 受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论的影响 (王文斌、李民, 2016), 教材聚焦学生的“学”, 更侧重学生的学习活动, 更像是“学材”。最后, 在教材的外延方面, 任何能够促进语言学习的物理实体、文本、环境、标志、技术等都可以被纳入教材的范围。这可能与后方法时代有关, 后方法时代的教师可以不拘泥于某一种教学方法, 而是依据学情和教学目标, 广泛地选取合适的语言教学材料 (Kumaravadivelu, 2006; 束定芳, 2023)。

上述三个时期对教材的定义也可以结合 Tomlinson (2012) 关于外语教材功能类型的论述进行对比分析。作为内容的教材是信息性的 (informative), 即能够向学习者提供关于目标语言的信息; 作为内容 / 任务的教材不仅是信息性的, 还可以是教学性的 (instructional)、体验性的 (experiential) 和引导性的 (eliciting), 即能够指导学习者学习语言, 帮助学习者感受语言的使用, 并进一步鼓励学习者主动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教材不仅具有上述功能, 还具有探索性的 (exploratory) 功能, 即能够帮助学习者探索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知识等。由此看来, 以上三个时期的发展似乎是从“教材时代”到“后教材时代”的过渡。教材的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在不断解构中又被重新建构, 最终构建出与这个时代和当下语境最契合的定义。

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教育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除去上述三种外语教材, 新形态外语教材也应运而生。新形态外语教材是指以各学段外语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依据,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 集纸质材料、数字化资源和配套软件平台等多介质材料于一体的系统化外语教学资源 (李宝贵, 2023; 杨莉芳, 2024; 张丹, 2019)。新形态外语教材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外在形态新、内在结构新和使用方式新。首先, “外在形态新”凸显了新时代外语教材物理形态的多样性, 涵盖传统纸质教材、电子教材、教学课件和在线题库等教学素材, 以及线上共享课程、互动交流软件和合作学习平台等相关教学资源 (杨莉芳, 2024)。其次, “内在结构新”主要体现在各教材间具有很强的

融合性和系统性，即各种教学资源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同促成外语教学目标的实现（李宝贵，2023）。最后，“使用方式新”主要是指在教材的互动性方面新，相较于传统纸质教材，数字教材、互动交流软件和合作学习平台等资源在教学中的使用增强了师生与教材的互动，有助于打破传统外语教材与外语学习者之间信息流动的单向性（黄明东等，2022）。

1.3 外语教材的重要性

关于外语教材是否具有价值这一话题颇具争议，而对教材价值的辩论也已司空见惯。许多应用语言学家认为，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教材。例如，Allwright（1981）和 O'Neill（1982）曾在《英语教学杂志》（*ELT Journal*）上进行公开交流，讨论全球性教材的价值。Allwright（1981）指出，语言学习的过程纷繁复杂，因此任何一套预先设定好的教材都难以穷尽并预设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形。然而，O'Neill（1982）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可以设计出既适合具有多样化学习目标的学习者，又适合不同类型教师群体的教材。在 O'Neill（1982）的研究中，他对每个学习群体都需要特制教材以满足其独特需求的观点表示质疑，同时强调不同学习者之间的共性需求，即掌握丰富的语言规则以便灵活自如地使用语言。上述立场或许加深了学界对教材作用的认识，即学习者、教学环境与教材之间不存在“完美契合”的关系（Maley, 2011: 379），同时该立场也反映出学界对全球性教材是否适合特定文化背景的担忧（Garton & Graves, 2014; López-Barrios & de Debat, 2014）。例如，中东地区的一些高校曾在教材选择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起初，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土学生的文化背景、满足评估要求和保障学习效果，这些大学偶尔会开发自己的本土教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性教材在内容质量、呈现形式、表面效度和学生信任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优势，这些大学最终又重新采用了全球性教材（Al-Busaidi & Tindle, 2010）。除此之外，反对使用教材的学者还认为，教材规定了课堂教学的内容，这反而“剥夺了教师和学习者的权利”（Tomlinson & Masuhara, 2018: 26）。进一步来说，教材的选用权往往集中在管理者手中，教师参与决策的机会较少，学生则不具备选用教材的权利。因此，教材开发

主要着眼于满足管理者和教师的期望，学习者的需求往往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Tomlinson, 2010a, 2010b)。

了解学界对外语教材的不同看法可以使我们更为客观地认识外语教材的作用。我们认为，外语教材是外语课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载体，对促进外语教育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外语教材以一种有效的、省时的、有组织的、有逻辑的并且系统的方式为外语教师和学习者提供资源，使外语学习者能够接触并了解目标语言，为他们提供语言练习和产出的机会，并鼓励他们发现语言的规律 (Tomlinson, 2012)。可以说，外语教材是学生输入语言文化和在课堂中进行语言输出的主要载体，也是外语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Hutchinson & Torres, 1994;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外语教材为语言教学提供了结构化的框架，并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介绍与目标语相关的知识（如语法概念、词汇知识、社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等）和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看、译），从而帮助学习者系统地发展语言能力。这种结构化体系对于没有信心提供准确语言表达和恰当语用策略的外语教师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Norton & Buchanan, 2022)。以下三项国际范围的调查也进一步证实了外语教材的重要性：(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调查显示，65% 的教师经常或总是使用教材，仅有 6% 的教师从未使用过教材 (British Council, 2008, 转引自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2) Tomlinson (2010b) 的调查发现，92% 的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使用教材，其中超过半数是被所在学校或机构要求使用的。(3) Saw (2016) 调查的 85 位来自缅甸和英国的教师中，仅有 3 位未使用教材。此外，在我国大中小学外语课堂中，教材是教师不可或缺的教学材料，同时也是学生最规范、最核心的学习材料。在外语教育环境中，使用相同的教材还有助于在不同班级或学校之间实现教学内容的统一。

其次，外语教材对我国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发展、文化意识培养、思维品质提升以及品格和价值观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外语教材不仅是课程制品，也是一种“文化制品” (Gray, 2016: 99)，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外语教材蕴含目标语社会的文化产品、实践、观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内容，传达了特定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标准。这些内容为语言学习者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世界多元文化，拓展国际视野并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更好地承

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时代新人。同时，外语教材中蕴含的母语文化，能够深化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理解，促进他们与母语使用者的深入连接和共情。通过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学习者可能会审视并思考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这种反思的过程对其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选择和使用内容丰富、质量一流的外语教材，对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开放心态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并进一步影响学习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语言也是思维的载体，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逻辑架构。通过使用外语教材，学习者可以了解并适应这些特有的思维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决策习惯。因此，高质量的外语教材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能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

总之，从宏观视角来看，外语教材作为外语教育的基石，在课程设计与实施、学科建设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维护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徐锦芬、刘文波，2023）。从微观育人层面来看，外语教材的科学选用和深入挖掘，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用优质的外语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能，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塑造开放包容的心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因此，外语教材建设（materials development）已成为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乃至全社会关注和积极推进的重点。

1.4 外语教材使用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外语教材使用贯穿日常外语教学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与外语教材的使用实践相比，对外语教材使用内涵的研究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学界尚未对“外语教材使用”这一概念进行统一的界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该领域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鉴于此，本小节将系统梳理学界对“外语教材使用”的界定，归纳其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对外语教材使用的操作性定义，以期规范研究术语，明确